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5.06.011

论《镇与城》中的空间书写

郁敏

(淮阴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1)

摘要:杰克·凯鲁亚克的《镇与城》通过新英格兰工业小镇的空间叙事,以马丁家族三代人的经历为背景,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的空间重构。小说围绕生产空间、异域空间与家宅空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工业化与战争暴力瓦解传统地方联结,而家宅空间则借助记忆与情感,成为抵抗现代性异化的诗学场域。在数字技术与地缘政治重塑空间感知的当下,该作品为理解动荡时代的认同危机提供了历史参照,彰显了文学空间批评介入现实的理论潜力。

关键词:杰克·凯鲁亚克;《镇与城》;生产空间;异域空间;家宅空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6-0095-07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激烈碰撞的21世纪,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空间生存困境。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全球性流行病的持续侵扰以及局部战争的此起彼伏,共同构成了一幅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图景。AI技术的快速迭代、数字网络的全面覆盖以及交通技术的不断革新,虽然实现了物理空间的压缩,却非但没能缓解现代人的存在焦虑,反而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的迷茫与不安。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摒弃传统的时间线性叙事,转而关注当下的空间生存体验,重新思考身体与栖居空间的本质关系。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对空间性的强烈关注,与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的社会心理形成了惊人的历史呼应。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得发轫于20世纪中后期的“空间转向”理论在当下愈加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作为空间书写的文学典范,“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代表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作品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曾精辟地指出,正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空间意识才成就了他以及整个20世纪40年代“垮掉的一代”创作特色^①。在其“在路上”系列小说中,凯鲁亚克通过主人公的漫游轨迹,构建了一个横跨北美大陆的文学地理空间:从新英格兰的故乡小镇到纽约的时代广场,从丹佛的酒吧小巷到墨西哥城的破败旅馆,最终抵达大瑟尔的森林小屋。这种通过身体移动实现的空间转换,不仅成为“垮掉的一代”精神追寻的外在表现,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空间叙事美学。然而,从空间书写的完整性与历史纵深来看,凯鲁亚克的首部长篇小说《镇与城》(*The Town and the City*)或许更具研究价值。与具有明显后现代特征的《在路上》(*On the Road*)不同,这部现实主义风格浓郁的半自传作品以作家的成长经历为蓝本,通过乔治·马丁一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空间叙事体系:以新英格兰工业小镇为原型的生产空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战场为代表的异域空间以及以家族老宅为核心的家宅空间。这三种空间的交织与碰撞,不仅真实再现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更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全球战争对普通人生活空间的双重异化。尽管起初小说获得的“评论毁誉参半、销量寥寥”^②,但在当代语境中,《镇与城》的空间

收稿日期:2025-07-25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4SJYB1402)

作者简介:郁敏(1978—),女,江苏沭阳人,博士生,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艾伦·金斯堡:《我们这一代人——金斯堡文学讲稿》,惠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7页。

②Clark T. *Jack Kerouac*. New York:Thunder's Mouth Press,1984,p.88.

书写既可视作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记录,亦是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深刻隐喻,颇具时代意义。

一、资本驱动的小镇生产空间

《镇与城》中描绘的“镇”——加洛韦(Galloway),其原型正是凯鲁亚克的故乡马萨诸塞州东北部的工业小镇洛厄尔(Lowell)。洛厄尔不仅是凯鲁亚克成长的现实空间,也是一座深受资本逻辑重塑的工业样本城市。它毗邻波士顿,位于梅里马克山谷,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这为其日后成为美国工业革命前沿阵地奠定了自然资源基础。

“小说是环境史。”^①凯鲁亚克在小说开篇就通过精确的地理书写构建了一个真实可感的空间场域。除了对小镇名称的文学化处理之外,书中对梅里马克山谷地带的地理特征、水文系统及城镇布局的描写都与现实保持着高度一致。这种“地理写实主义”的叙事策略不仅赋予作品强烈的空间真实感,更将小说空间表现提升为考察环境变迁的历史文本。小说中描绘的工业景观,诸如高耸的砖砌纺织厂沿着河道密集排列,日夜运转的机器“整晚嗡嗡不绝,人来人往”^②,铁路网络穿透城镇肌理连接区域经济等,这些空间要素共同构成了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概念的物质见证。从中心广场的商业区、沿河的工业带,到跨河而居的工人社区,这种功能分区鲜明的空间结构典型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实践逻辑。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通过物质实践创造出来的空间性(如果它们是生活、交往、工作、象征活动和仪式以及享乐的框架)也构成物质框架,在其中,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话语实践得以展开。”^③

这个位于荒野与森林之间的工业小镇的兴起,实质上是美国工业化进程的空间缩影。从17世纪殖民拓荒到19世纪工业革命,原本的自然景观被资本力量彻底重构:河流被运河化以服务水力纺织,森林被砍伐以建设工厂,荒野被规划建为工人居住区。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空间被“加工、塑造和改变”^④了。这种空间转变印证了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论断:“全部的殖民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空间导向的定居进程,在其间,秩序与场域相结合。”^⑤凯鲁亚克通过“文学绘图”(literary cartography)的话语实践,不仅再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空间形态,更揭示了自然环境被拽入资本积累的轨道,从而异化为“第二自然”的历史过程。

新英格兰北部多山,土壤贫瘠,但丰富的森林和水力资源以及显著的交通优势为纺织业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有利条件,使其在1807年杰斐逊颁布禁运法与1812年美英战争后摆脱英国纺织业影响,迅速进入工业革命阶段,商人和机械师们在北方各州掀起了一场纺织厂建设浪潮。洛厄尔小镇正是这一时期典型的“资本—技术—空间”三位一体生产模式的代表。自1813年起,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引入英国纺织技术,并建成集纺纱、织布、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工厂,形成以流水线为基础的大型工厂化发展模式,而这标志着美国工业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转变。

随着纺织行业工厂化普及和人口增长需要,洛厄尔开始吸纳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劳动力,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参与度,建造出工人宿舍、公共图书馆、教育机构等配套设施,逐渐成为工业城市规划的范式。一幅由G. W.博因顿(G. W. Boynton)于1845年绘制的洛厄尔城地图显示,这座城市已呈现出高度结构化的工业空间形态。查尔斯·狄更斯在1842年访问洛厄尔时,曾惊讶于其井然有序且充满生气的城市风貌,并将其工厂与英国曼彻斯特的工厂进行对比,“这将是一个强烈的反差,因为它将是善与恶、鲜活的光明和最深重的阴影之间的对比”^⑥。可见,洛厄尔不仅消解了人们对工业社会的恐惧,还传播

①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②杰克·凯鲁亚克:《镇与城》,莫柒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下文引自该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③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

④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⑤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

⑥乔舒亚·B.弗里曼:《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李珂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65页。

了这样的观点,即“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改善都可以通过技术先进的工业来实现”^①。

凯鲁亚克却对工业资本主义在洛厄尔的发展持批判态度。如上所述,洛厄尔的空间规划并非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由纺织业生产关系,即资本逻辑所决定的。正如哈维所言:“在任何一种情形中,新的地方网络诞生,被构造成嵌入大地上的固定资本和矗立在大地上的组织的社会关系、制度等构型……它们所产生的地理景观不是平衡发展的,而是有极大差别的。通过不平衡的资本投资的简单逻辑、大量涌现的劳动力的地理分工、不断增长的再生产行为的碎片化,以及空间上有序的(常常是隔离的)社会区分(如把吉尔福德同它周围环境分隔开来的那种区分)的兴起,‘差异’和‘他性’在空间中被生产出来。”^②洛厄尔的工厂区沿河而建,商业区、教育区等功能分区均严格遵循资本积累需求,而居住空间则成为阶级差异的具象化表征。

尽管相较于 19 世纪英国曼彻斯特纺织工人,洛厄尔的工人们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但空间区隔依然清晰地映射着社会阶层的分化。恩格斯在考察曼彻斯特时曾尖锐指出:“所有这些地方都形成了一个纯粹的工人区,像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宽的带子把商业区围绕起来。在这个带形地区的外面,住着高等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中等的资产阶级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而高等资产阶级就住得更远,他们住在……郊外房屋或别墅里,或者住在……空气流通的高地上。”^③这一空间隔离模式在洛厄尔同样突出:资本家占据着沿河的高大砖砌宅邸,而工人阶级则被推向城市边缘,栖身于杂乱灰暗的维多利亚式房屋中。凯鲁亚克在他“绘制”的文学地图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这种空间差异性:“过桥去郊区,沿着住宅区边缘的公路爬升,就能看到房舍群落,覆盖着常春藤的石头房子是法官宅邸,门廊立着木头圆柱的白色老房子是一个奶牛场,而灰暗、杂乱无章的维多利亚式房屋则就是主人公马丁一家的住所:高高的树篱环绕,树木高大繁茂几乎模糊了房子的正面,旧门廊上有张吊床,凌乱的后院有一间车库、一间牲口棚和一个老的木头秋千。”这种空间安排绝非偶然,而是资产阶级通过城市规划实施的政治操控,其目的在于维持阶级秩序的稳定性。

“在把空间理解为社会实践的产物方面,列斐伏尔引入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概念,并由此将社会空间看成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④更进一步来说,这种空间分割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权力技术的实施结果。在洛厄尔,工人阶级被限制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而资产阶级则通过占据优越的地理位置来彰显其社会支配地位。这种空间隔离不仅强化了阶级差异,还通过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如通勤、消费、社交)不断再生产着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同时,纺织业发展、人口增加和城镇规模扩张不仅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多元化,也重构了洛厄尔的社会阶层结构。部分居民逐渐脱离工厂体系,转而从事餐饮、服装、印刷、金融等行业,形成了依附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群体。然而,在资产阶级的宏观空间调控下,资本通过剥削、竞争与金融手段不断重塑地方经济格局,使部分工厂扩张为垄断企业,而另一些则被边缘化直至破产。这种空间暴力不仅作用于工人阶级,同样吞噬着无法适应资本逻辑的小生产者。

凯鲁亚克笔下的乔治·马丁(原型为作者的父亲利奥·凯鲁亚克)正是这一空间暴力现象的典型受害者。作为 20 世纪初的小印刷厂厂主,马丁与妻子玛格丽特共同养育着八个孩子,依靠微薄的经营收入勉强度日。“我讨厌、厌倦了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一切……我在这里拼命工作了二十年,但年收入却从来没有超过六千。”这段自白揭示了小资产阶级在资本挤压下的生存困境:马丁的善良本性与缺乏资本积累的野心使他的工厂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最终在金融资本的竞争中彻底溃败。“他已经无望及时偿还债务和偿付昂贵印刷器材的按揭贷款——多年来他一直试着缓慢清偿。”这一细节生动展现了小生产者即便勤勉经营但仍难以避免被资本信贷体系与市场垄断吞噬的悲剧命运。

然而,凯鲁亚克并未将乔治·马丁塑造成纯粹的悲剧角色。在失去工厂后,马丁以工人阶级的乐观

①乔舒亚·B.弗里曼:《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李珂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66 页。

②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39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27 页。

④阎嘉:《新资本主义的空间问题:以列斐伏尔的〈空间与政治〉为例》,《外语与外语教学》2021 年第 1 期。

态度宣告：“我们也许破产了，可我们保留着我们的诚实和我们的灵魂。”很快，他在另一家印刷厂找到稳定工作，完成了从小资产阶级到工人阶级的身份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个体命运的转折，更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重组：经济大萧条摧毁了无数小生产者，迫使他们沦为雇佣劳动者；而二战的爆发则进一步撕裂了传统社会纽带，使马丁一家背井离乡，流散各地。

二、战争解构的离散异域空间

战争作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极端表现形式，暴力瓦解了加洛韦小镇规划整齐的工业空间。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标志着美国由“孤立主义”彻底转向全面参战。罗斯福总统旋即签署新版《选征兵役法》，规定所有18岁至64岁男子必须登记，20岁至44岁男子须服兵役^①。小说中，乔治·马丁家的子女们被这场全球性的战争抛掷到不同的战场与营地，被迫进入陌生的异域空间，他们“如灯光般散落在土地上”，构成一幅典型的“离散空间”景观。长子乔在欧洲战区服役，次子弗朗西斯在芝加哥军事营地受训，三子彼得在地中海往返建设空军基地，四子查理最终命丧日本冲绳战场。凯鲁亚克借助马丁夫妇对子女的凝望视角，绘制出一幅“散点式”的战争地图，凸显战争对传统家庭社会结构的撕裂与空间意义的重构。

在遥远的异域空间，个体被投向陌生的地理与文化环境中，面临语言、习俗、气候甚至价值观的深刻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带来生理与心理的错位，还易于引发个体身份认同危机。更为关键的是，军事空间的纪律化与战争空间的暴力化，使得原本熟悉的“人居空间”异化为“敌意空间”，个体的异域经验因此充满孤独、压抑、焦虑，乃至个体形成精神性创伤。

长子乔在珍珠港事件后积极响应征召，加入美国空军。他起初怀着正义感参战，视战争为“保卫美国、反对法西斯”的英雄行为，但其父乔治·马丁则洞察到战争的荒谬：“这是白痴大干一场的时代……让好青年去干掉其他好青年。”起初，乔在阿拉巴马接受军事训练，后被派往欧洲战区。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战机被击中，他在迫降英格兰海岸的过程中折断手臂。伤愈归国后，他已不再是昔日意气风发的青年，战争摧毁了他的激情与信念。他时而沉默压抑，时而狂笑暴怒，体现出战争创伤在其精神层面留下的深刻烙印。

相比之下，次子弗朗西斯的战争体验更具心理维度的复杂性。1943年从哈佛毕业后，弗朗西斯希望进入海军军官行列，却因测试没有通过而被派往芝加哥营地。营地生活的粗鄙与压抑加剧了他的身份认同危机。“他憎恶自己在世界上的新位置，无法克制。”最终，他通过伪装成精神异常的士兵完成退役。父亲乔治·马丁跨越千里的探望之旅打破了异域空间造成的精神疏离。父亲携带的故乡记忆象征着一一种治愈与认同的回归。这一亲情的再联结，正是凯鲁亚克对战争异化之下人性温情的一种回归书写。

三子彼得的异域经历更强调空间体验与情感波动之间的互动。他以商船海员身份前往格陵兰岛，为美军建设空军基地。德军潜艇的威胁与北极的极端环境，加剧了彼得的恐惧与无力。而因纽特人淳朴的笑容，则激发了彼得强烈的伦理内疚，使其深刻意识到自身作为“他者”对原初和平空间的侵入。为应对这种地理与情感的双重疏离，彼得在梦境中将格陵兰的异域景观转化为熟悉的家乡图景，试图消解空间断裂带来的身份焦虑与道德困境。当他得知曾搭乘的“威斯敏斯特号”被击沉，昔日船员全部遇难后，彼得终于打消了“英雄”幻想，开始了象征逃避与寻找自我的“在路上”之旅。

战争不仅塑造个体的离散情感地图，也重构了地方的物理空间。原本静谧的村庄被改造成军事基地、兵工厂、训练营，甚至神话化成格列佛式的“小人国”，充斥着工业化的模式规训与抽象化的效率逻辑。火车穿越山洞，卡车穿行荒野，战舰穿梭海面，战争以“空间再编码”的方式改变着地理面貌与社会秩序。此外，凯鲁亚克通过全景视角揭示了国家如何通过空间的重新组织来服务于战争生产。弗吉尼亚的工地、哈德逊的工厂、印第安镇的卡车、旧金山的军港以及广岛与长崎的空域，共同组成了一张全球

^①钱满素：《美国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战争空间的网络。在这一网络中,普通人的日常被政治意志重构,空间不再中立,而是成为国家暴力的容器。交通发展带来的空间压缩与位移进一步带来身体经验的变异。年轻士兵短时间内从熟悉的家乡酒吧被转移至荒原军营,无法适应突如其来的被剥夺与被支配感。“人类会根据自己的身体或者与其他人接触获得的经验来组织空间,以便所组织的空间能够满足自己的生物需要和社会关系需要。”^①但在营地中,他们丧失了这种组织能力,只能被动服从。在陌生的异域环境中,他们的身体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精神被压抑至极,以致在战后留下深刻的心理创伤。

当外部空间因资本与战争的暴力而变得疏离时,记忆中的故乡便成为抵抗精神异化的情感堡垒。这种情感依附印证了段义孚(Yi-Fu Tuan)关于“地方依恋”的论述:“地方是一个存放美好回忆和辉煌成就的档案馆,这些美好回忆和辉煌成就激励着当代人奋发有为。”^②凯鲁亚克通过空间诗学叙事,在批判资本主义对地方生态的破坏以及战争对家庭结构与个体情感的撕裂的同时,也展现了普通人在结构性空间暴力下维系坚韧情感联结的方法,即重返故乡所在的地方。

三、诗意栖居的故园家宅空间

“故乡是一种中等规模的地方”^③,而故乡的家宅则是人类最初的宇宙。法国思想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的诗学》中指出:“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④对个体而言,家宅不仅是肉身的栖居之所,更是精神的归宿,是记忆、情感与身份认同的交汇点。在巴什拉看来,家宅空间不是简单的几何结构,而是被情感与想象力塑造过的生存空间,是诗意栖居的原点。“人只有首先获得‘家宅’的庇护、家人的支持才可以远离孤独感和疏离感。”^⑤这一空间不仅庇护着人类的肉体,更承载着人类的梦想、记忆与情绪,提供一种“亲密的空间经验”。继巴什拉之后,爱德华·C.雷尔夫(Edward C. Relph)等人提出“地方感”概念,进一步指出,个体与特定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结与象征性投射,是理解现代人空间经验的关键。“其实,家园就是人类存在的基础,不仅为人的活动提供了场景,还为个体与群体的安全感与认同感提供了归属之地。”^⑥在凯鲁亚克的《镇与城》中,家宅空间不仅作为现实存在的居所呈现,更作为一种精神图景、一种象征性的生命空间贯穿始终,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感”特征。家宅因此成为人物心理建构与文化身份认同的核心所在。

哈维曾提出一个深刻的命题:“但是,这种地方感只局限于作为家的房屋吗?或者说,它延伸至更广泛的作为家园的……地方感吗?”^⑦这一追问揭示了现代性“家”的空间重构。当固定居所的传统意义被工业化与城市化消解时,人类开始在其他空间形式中寻找情感依托。从抽屉、贝壳等微观空间,到道路、家乡等宏观地理,都可能成为承载记忆与梦想的“幸福空间”。这种空间不仅具有物理属性,更是一种精神隐喻,是主体对抗现代社会异化的诗意栖居。

在凯鲁亚克的文学世界中,卡车与公路是一种流动的“家园”。长子乔·马丁的形象集中体现了这种空间认同,他狂放不羁的性格与凯鲁亚克本人的自由意志形成镜像。十七岁时,乔便以一场车祸宣告了对规训空间的叛离:他借车前往佛蒙特会见女友,狂欢后失控撞树,车辆损毁但好在人身无恙。这一细节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传统“家”的稳定性被公路上的冒险所颠覆,而肉体幸存则暗示着流动空间对主体的救赎潜能。二十岁时,乔彻底放弃学业,成为往返于波士顿与巴尔的摩两座城市的卡车司机。然而,程式化的运输路线也很快暴露出资本逻辑对生存空间的再次规训:他与工友在两地酒馆间日复一

①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②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页。

③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2页。

④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⑤王桃花、罗海燕:《温特森〈正常就好,何必快乐〉的空间解读》,《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⑥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刘苏、相欣奕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68页。

⑦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页。

日地过着颓废的生活,“烂醉、跳舞、蹒跚于黎明街道,次日于廉价客栈苏醒”。

乔的这种异化生活最终催生了他空间反抗的爆发:在一次卸货后,乔与同伴未按计划返回公司,而是盗车西行,开启了一场横跨匹兹堡的疯狂之旅。凯鲁亚克以意识流笔法再现了这场逃亡:“所有一切都没有经过片刻思考就去做了……他们所能想起的只有卡车狂奔的速度,公路沿途的月光草地,高高驾驶室里的喊叫和笑声,路边的午餐小馆子,春夜里的音乐和疯狂以及一片一片美国的广阔土地。”这段描写解构了公路的工具性意义,将其升华为列斐伏尔所倡导的“空间实践”,即通过速度、噪声与非理性狂欢,乔短暂挣脱了资本时空的枷锁。

这一情节与凯鲁亚克自身的“背包革命”经历形成互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在汽车工业的推动下进入“公路现代性”阶段。1926年建成的国道系统(尤以66号“母亲之路”为标志)不仅重塑了地理景观,更催生了新型文化想象。正如凯鲁亚克所写:“那个春天,一种抒情的狂喜攫取了某些美国年轻人……一种疯狂不安的去别处、走四方的渴望,立刻上路。”公路由此成为青年亚文化的符号,它既是“福特主义”(Fordism)生产的物质基础,又是反抗规训的精神通道。卡车驾驶室这一封闭又开放的矛盾空间,因此成为现代性中最富诗意的隐喻,车窗外不断更迭的风景被转化为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块茎”与“逃逸线”(rhizome and line of flight)式认知地图^①。凯鲁亚克通过这种文学建构,最终将公路从资本所打造的基础设施转化为“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家园,完成了对哈维命题最激进的回响:当房屋不再能整合梦想时,飞驰的车轮亦可成为心灵的锚点。

忧郁敏感的弗朗西斯·马丁体现出凯鲁亚克性格中最复杂的一面。弗朗西斯的形象既是对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冷峻知识分子气质的文学投射,又是凯鲁亚克早夭兄长吉拉德(Gerard Kerouac)的精神化身。这个“带着不可侵犯的高贵和老练气质”的年轻人,在空间选择上呈现出知识分子的典型矛盾。加洛韦公共图书馆成为他逃离平庸的精神“飞地”,这种由书籍构建的再现空间既是小镇的实体建筑,又是通往抽象知识世界的门户。在这里,文学想象为他提供了超越地理限制的可能,使图书馆成为一个具有阈限性特征的特殊场域——它既提供与小镇庸常生活的安全距离,又构建起连接更广阔世界的认知通道。当弗朗西斯质问“我的威尼斯太阳在哪里”时,他正通过这种空间实践对小镇生活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与重构。

然而,这种空间逃离最终导向一个存在主义式悖论。弗朗西斯对家宅的厌恶与对都市的向往,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知识青年所面临的典型现代性困境。他将都市想象为启蒙理性的理想王国,却在实际遭遇中发现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揭示的权力规训与精神异化。这种幻灭体验促使他重新审视故乡的价值,在空间认知上完成辩证的反转。凯鲁亚克本人在生命最后三年重返洛厄尔的行动,正是这种空间辩证法在现实中的体现。尽管曾激烈批判故乡的封闭性,但洛厄尔始终作为无法割舍的精神纽带存在于作家的意识深处。

彼得·马丁的成长轨迹同样呈现了现代性语境下空间认同的复杂辩证关系。作为从加洛韦小镇走向名校的橄榄球明星,大学橄榄球场的制度化竞争空间消解了彼得在家乡小镇球场的地方性空间中所获得的主体性认同。这种空间差异导致的认知落差促使彼得重新发现家宅的本真价值。当返乡的火车穿越雪原鸣笛时,“难以形容的喜悦和对家的渴望”昭示着小镇的“灰色老房子”因其承载的存在记忆成为彼得真正的诗意栖居之地。

小说中彼得对加洛韦的深度依恋与弗朗西斯反向的逃离冲动,构成了凯鲁亚克内心矛盾的空间投射。这种二元对立超越了个人心理层面,成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社会空间转型的生动隐喻:彼得代表传统的依附,体现危机中人们对稳定性的渴求;弗朗西斯则象征现代的空间流动,反映工业化对传统社会关系的撕裂。通过这对矛盾,凯鲁亚克在作品中不仅呈现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更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空间认同危机。最终,弗朗西斯的精神返乡暗示着一种超越二元

^①Kherif S, al-Khawaldeh S. “Spatial Nomadology in Jack Kerouac’s Lonesome Traveler: Kerouac as a Becoming-Noma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2020, 8(12):1-16.

对立的可能性。真正的家园或许不在于物理位置的固定与否,而在于主体与空间建立的辩证对话关系,这种关系既承认现代性的流动需求,又保持对地方性价值的深刻理解。

在历史语境中,凯鲁亚克对家宅空间的建构亦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意涵。20世纪中期的美国正经历工业化、都市化的加速发展,传统小镇生活方式面临冲击,家庭结构趋于碎片化。家不再是稳定而自明的伦理中心,成为漂泊者心灵投射的象征物。凯鲁亚克通过复调化的人物视角揭示出:家宅既是安全的,也可能是压抑的;既是归属的起点,也可能是逃离的重要因素;既让人眷恋其温情结构,又不得不哀叹其解体命运。家宅空间不再是中性的存在,而一跃成为冲突、记忆与创伤的多维交汇点。因此,《镇与城》中对家宅空间的描写并不仅仅是对童年与亲情的怀旧式重温,更是对现代人在城市化与自由化浪潮中空间经验断裂的深切体察。凯鲁亚克以细腻的笔触、流动的结构和复调的视角,建构了一个复杂的空间叙事体系,将家宅空间塑造为既具体又抽象、既稳定又动荡的文化场域。这一空间既保存着“诗意栖居”的温度,也承载着现代性创伤的余烬,最终成为“垮掉的一代”精神地图中的重要坐标。

结语

杰克·凯鲁亚克运用忧郁而深邃的时空意识,对战前宁静小镇与战后动荡都市、故土与异域进行全景式的空间书写,在描绘资本扩张与战争暴力如何撕裂人际关系、重构社会空间的同时,试图通过对故乡记忆与都市异化的书写,重建个体与世界之间的意义关联,直面现代人因失根而产生的荒诞感与离乡之痛。放眼当下,全球资本扩张与地缘冲突带来的空间变动,仍在持续重塑人类的生存格局与精神地图。人们在急速变动的社会结构中丧失原初的安全感与归属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空间的操控力量也愈发渗透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镇与城》的价值恰恰在于,它不仅是一部关于战时美国的家庭史诗,更是一面映照当代生存状态的镜子。小说中的乔治·马丁一家在离散与重聚之间的挣扎,隐喻了现代人在流动社会中寻找归属的永恒命题。凯鲁亚克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未提供廉价的怀旧或虚幻的回归,而是探索了一种动态的空间经验——真正的归属并非固守某一物理空间,而是在流动中保持情感的连续性,在变迁中守护精神的原点。在破碎的世界中,人类依然可以通过记忆、叙事与情感联结,重建属于自己的“幸福空间”。

On Spatial Writing in *The Town and the City*

YU Min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an 223001, China)

Abstract: Jack Kerouac's *The Town and the City*, through its spatial narrative centered on a New England industrial town, depicts the spatial reconfigur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ia the experiences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Martin family. The novel constructs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among productive space, exotic space, and domestic space, revealing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t spatial produc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violence of war erode traditional local bonds, while domestic space, anchored in memory and emotion, emerges as a poetic realm resisting the alienation of modernity. In an era wh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geopolitical forces are reshaping spatial perception, the novel offers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dentity crisis of the age of mobility and highlights the theoretical potential of literary spatial criticism to engage with contemporary reality.

Key words: Jack Kerouac; *The Town and the City*; productive space; exotic space; domestic space

(责任校对 朱正余)